

司 法 部 學 習 材 料 之 三

檢 察 制 度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司 法 部
司 法 部 輪 訓 班 編 印



1 9 5 0 年 6 月

目次

一、各國檢察制度綱要·····	李六如(一)
二、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制·····	列寧(一六)
三、蘇維埃檢察機關組織的基本原則·····	維辛斯基(二一)
四、蘇維埃檢察機關的任務與功用·····	維辛斯基(三一)

附錄

蘇維埃檢察機關組織系統表

參考書目

各國檢察制度綱要

最高人民檢察署
副檢察長 李六如報告

雖有各種不同的檢察制度，但歸納起來，可根據階級本質不同的國家，分爲下列三種類型：（一）資本主義各國的檢察；（二）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三）新民主主義各國與新中國的檢察。由於他們的本質各有不同，故其任務亦有差別，未可單從形式上概而論，先從檢察之淵源及作用說起。

一 檢察之起源及作用

1. 從私有財產制產生，形成剝削與被剝削兩個敵對階級，因而就有國家，國家乃是一階級統治另一階級最有力的機器。資本主義學者，則以領土、人民、主權、爲構成國家的三大要素，這是不對的定義。因爲它有軍隊、警察、法院、監獄這一套武器爲其後盾，檢察原也就是屬於司法範疇，保護國家行使法權，最有力的武器。

2. 在奴隸與封建國家沒有劃分什麼立法、司法、行政的時期，當然沒有明顯的檢察

制度。但自十四世紀，法國產生檢察機關以後，（在中國是自清末光緒時代）世界各國，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都同樣有檢察機關的。

3. 可是，由於階級社會性質之不同，其檢察機關，形式雖同，而本質和作用，則有根本不同之點。例如：

資本主義國家的檢察，名為代表國家甚麼公訴，實際就是代表壓迫和剝削階級利益，專門檢舉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革命和反抗富有者的。他們的檢察制度，也大同小異的，只是刑事偵查、檢舉與公訴，管轄範圍並不寬。對審判機關，雖則也說是獨立行使職權，實際上等於法院的配偶或附屬機關。上下級領導關係也不一樣，一般說，大都是隸屬於司法機關之內的。不像蘇聯的檢察單月成爲一個獨立系統。

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則大有不同，因為沒有剝削與被剝削階級存在，所以它（檢察）主要是政府的法律監督機關。一方面雖是司法監督，即代表國家，保障一切法律能正確施行和運用，換句話說，即是檢察、司法、公安等機關，有無違法判決與違法事件。另一方面則是一般監督，即代表國家，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權益，檢察政府的法律、法令、決議、政策等之嚴格執行，換句話說，即是檢察政府機關，公務人員、陸海空軍、公民有無違法措施與違法行爲。職權很大，範圍很寬。因而其組織是垂直系統的一重領導，不受任何政府機關影響的。

至於各革命階級聯盟的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尤其新中國的檢察制度，當然不能也不

應該是資本主義與舊中國那一套。可是由於社會性質與時代不同，經驗不多，幹部不練，暫只能按步就班地向着蘇聯的檢察制度方向逐漸推進，基本上仍是屬於蘇聯檢察這一範疇的。

二 資本主義各國的檢察

1. 法國的檢察組織最早，（十四世紀）其職權也較大，（指在資本主義各國比較大）除刑事外，也有時對法院有監督權與某些行政權。例如：檢察官參加解決法院內部的各種問題；例如：檢察官有權向初級審判官實行案件的查核；例如：出版刊物須得檢察官許可等等。司法部長對檢察官有任免和指示權。最高法院總檢察官，反無權指揮地方檢察機關。（初級法院無檢察）

2. 英國的檢察長通常是內閣閣員，依照刑訴法，無論政府機關和公民，都同樣有提起刑訴及以告訴人身份出庭之權利。同時在一八七九年，創立了一種在檢察長直接指導下的公訴管理人制度，然而，這不過是形式，在實際上被壓迫與被剝削的無產者，依然無處聲訴。

3. 美國的檢察長，除負刑事的檢舉之外，在最高法院得進行一切可能關涉聯邦利益的訴訟，也得提起聯邦各法院管轄的刑事案件，並得酌量停止這些刑事案件。而且聯邦檢察機關，還有實行法院行政之權。各州的檢察機關呢？其職權就不一樣，（有些州檢

察官可以監督銀行與路政之官職的名稱，也不盡同。多數州的檢察長是選舉，一部份又是由州長任命的。由總統任命的聯邦檢察長與各州的檢察機關，都無聯系。

4. 沙俄時代的檢察，雖從一七二三年到一八六四年這一時期中，檢察官負有監督地方政權機關之任務，但在實際上，檢察機關毫無力量反對地方政權的專橫。故其結果，亦僅是參加刑訴，有時參加民訴，對法院判決有提出異議之權而已。其組織領導，則是以兼任檢察總長的司法部長為檢察機關的首腦。在最高法院上告司中，設有若干隸屬於司法部長的檢察官，最高法院檢察與各級檢察機關是互不聯系的。

5. 法西斯時代的德國檢察，則是實施白色恐怖的重要工具，所以立法（例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法律）賦予檢察機關以極大職權——得在刑事案件中，舉行不受管制的偵查，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拘束，不論任何人，檢察官均得拘押之，可不送司法機關審理。

6. 法西斯時代的意大利檢察，雖同樣在各級法院中均有檢察處之設置，其威權亦很大。在一九三一年刑訴法規解釋中，很坦白地說檢察官並非奉行法紀的，只是告訴人。這就無異說禁止他採取任何行動來維護被告人的權益。在法院檢審聯合制度最低層的法員，將檢察官和法官的職責也合而為一，即自己（檢察官）提起刑事告訴，自己偵查，同時自己以法官的地位加以審理。

7. 日本帝國主義的檢察，名曰檢察，是成立於明治維新以後，完全採用大陸諸國的

制度，在大審院附設檢事局，內設檢事總長，控訴院附設檢事局內設分檢事長，各區及地方裁判所，同樣附設檢事局，內設檢事，概由司法部提請首相任命的，其職權只限於刑事檢舉，偵查與公訴，但因與憲兵隊警察密相聯系，常用非法手段，不經審判殘害人民，所以日本有「鬼檢事」之稱。

8. 舊中國的檢察，開始於清末光緒年間。在此以前，司法與行政不分，當然沒有檢察，有之，也就只有所謂朝廷中的御史彷彿有點近似。一直到光緒末年，預備立憲，才倣效歐美日，改刑部爲法部，改各省按察司爲提法司，改大理寺爲大理院，設總檢察廳於北京，通商大埠及各省，亦先後有高等地方檢察廳之設，並頒佈過審檢廳試行章程。迨民國成立，才制定法院編制法，採四級三審制度。民國初年袁世凱時代，廢除了各縣的初級審判廳，另於地方審判廳內設簡易法廳。改爲三級三審制，即北京爲大理院，省爲高等審判廳，縣爲地方審判廳，每級審判廳配置一檢察廳。一直到民國十六年蔣介石建都南京後，將大理院名稱改爲最高法院，各級審判廳一律改稱法院，各級檢察廳一律改爲檢察處。廢廳長，設首席檢察官。二十一年改法院編制法爲法院組織法，制度上變更很多了。在該法規定，將檢察機關配置於各級法院，最高法院設檢察署，內設檢察官若干人，以一人爲檢察長，高等法院及分院，地方法院及分院設檢察處，各置檢察官若干人，以一人爲首席檢察官，若檢察官僅一人時，不置首席檢察官。檢察職務的範圍，每因法令規定之變更而有廣狹之不同。在民國二十四年以前，舊民事訴訟條例，規定人

事訴訟，如婚姻事件，親子事件，禁治產事件，及死亡宣告等，均由檢察官參與。民國二十四年後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則皆予以刪除，僅限為刑事訴訟，如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協助自訴，担任自訴，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最高法院檢察長為簡任一級，由司法行政部推荐，國民政府任命，其餘首席檢察官簡任級及荐任級，均由司法行政部呈報行政院任命。

三 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

1. 廢除沙俄時代舊檢察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因十月革命後，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為要粉碎壓迫與剝削者，即地主與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枷鎖。所以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公佈關於法院的第一號法令中，把以前沙俄時代那一套幫助反動統治階級為爪牙的偵察和檢察機關一律取消了，在取消檢察機關的這五年當中，關於法律之監督，在中央由國家權力機關，尤其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後來將此職權移歸一九二〇年所建立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在地方，則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所選舉的司法委員，後來改由司法處執行，以代替從前的檢察機關，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刑事案件之偵查預審等職權，便責成蘇維埃所屬的偵查委員會執行，但關於地方法院所轄案件通常由地方審判員督同民警偵查。

2. 當一九二一年軍事共產結束，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期，列寧在第六次全俄蘇維埃代

表大會上，強調爲了新經濟政策，需要強大的革命法紀。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強調審判機關應被提升到最大的高度。建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一九二二年制定了刑民法，刑民訴訟法，土地法，勞動法各種法典，於是建立了監督國內法制的特別機關。——檢察機關，不過在一九二二年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上，關於建立檢察機關的組織原則和權力問題，曾有過激烈爭論，即列寧堅決反對許多委員主張『兩重從屬制』反對省執行委員會的非法決議不應有抗議權問題。（列寧是堅決主張查察機關應由上而下的一重隸屬制，對中央各部及各級政府的非法決議有抗議之權）

3. 斯大林堅持列寧這種檢察機關的組織原則，於一九二二年五月所頒佈的「關於檢察監督章程」所規定的職權是：「（一）用國家名義對於犯罪人提起刑事檢舉。對於違法決議提出抗議，實行監督一切政權機關，經濟機關，公共的及私人的團體和私人的一切行爲之合法性；（二）直接監督偵查機關和訊問機關在揭發罪行方面的活動，並監督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活動；（三）在法院中支持控告；（四）監督拘禁的正當性。」一九三三年六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又曾作出一次決議，指出檢察機關的五項任務：「（一）監督蘇聯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國家機關及各地地方政權機關的決議與命令合於憲法及蘇聯政府的決議；（二）監視各加盟共和國司法機關對於法律的正確和一致的適用。有權督促任何案件，在任何審理的階段，有權向上級司法機關抗議法院的刑事和民事判決，並停止其執行；（三）在蘇聯領域內，各級法院中提起刑事檢舉和支持控告

；（四）根據特別章程，監督國家政治保衛局、民警局、刑事警察及改造勞動機關行爲的合法性和正確性；（五）對各加盟共和國檢察機關的活動實行總的指導。」同年十二月又曾公佈過「關於蘇聯檢察機關章程」其主要內容是：「蘇聯檢察機關的命令，只有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得加以廢除和停止。」同時，在蘇聯檢察機關系統內加入了軍事檢察機關和鐵路與水運檢察機關。可見其權力之大，範圍之寬。

4. 可是從一九二二年建立檢察機關起，雖經過數度改進，各加盟共和國的檢察機關，仍繼續處於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的系統中，因而其統一和完全集中的原則，尙未能全部實現。即是說，加盟共和國的檢察長，還保留一方面服從蘇聯檢察長，一方面服從加盟共和國政府與司法人民委員會的兩重隸屬，迄一九三六年七月，才將所有檢察機關自各加盟共和國的司法人民委員部中移歸蘇聯檢察機關。從此，蘇聯檢察機關的集中統一過程，澈底實現了。

5. 自一九三六年斯大林憲法公佈，將檢察機關爲法制而鬥爭的特別地位更加提高了。憲法第一一三條規定：蘇聯總檢察長對於各部及所屬機關公職人員以及蘇聯公民是否確切執行法律，實行最高監督。憲法第一一七條指出：各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地方機關的干涉，祇服從總檢察長。憲法第一一四條規定：總檢察長由最高蘇維埃任命之，任期七年。憲法第一一五條：各共和國、邊區，省檢察長及自治共和國與自治省檢察長，由蘇聯總檢察長任命之，任期五年。憲法第一一六條：各州、區及市區檢察

長由加盟共和國檢察長呈經總檢察長批准後任命之，任期五年。

四 各新民主國家與新中國的檢察

1. 各新民主國家關於檢察制度的參考材料太少，僅就其憲法中可考者，約略述之：

(一)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五條：「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境內一切國家公務人員及全體公民遵守法律之監督責任，屬於檢察機關。」同法第九十六條：「檢察機關應特別注意偵察及懲處，破壞羅馬尼亞民主秩序及自由，經濟利益，民族獨立及國家主權之罪行。」同法第九十八條：「總檢察官由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民大會主席團根據政府提議任命之」。(二) 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檢察官為監視各省及該所屬機關、團體、公務員及一切公民，是否將法令正確的誠實的遵守並執行。」同法第九十一條：「檢察官為監視對各省的省令規則，及地方主權機關的決定、指示，是否適應於憲法、法令、政令及內閣的決定，指示。」同法第九十二條：「檢察所的首位是在最高人民會議任命的最高檢察官的檢察總長。」同法第九十四條：「檢察官不附屬於地方主權機關，獨立執行其任務。」(三)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憲法十二條中，僅一條載有法院沒有涉及檢察機關。至於其他新民主各國，連憲法亦未看到，故只能一概從略。

2. 新中國的檢察，雖自一九三一年在江西中央蘇區召開第一屆全蘇維埃代表大會時起，也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相同，只成立了司法人民委員部，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各

續法院與國家政治保衛局，從沒有設立過檢察機關。當時的工農檢察部，是專檢察與懲處各機關人員是否瀆職違法的機關。保衛局是專事偵察與鎮壓反革命的機關，一般刑事，也有時歸他檢舉與公訴。可是自一九三四年秋長征到陝北後，前一機關，無形取消了，後一機關則改為公安局。一直到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們的檢察制度，是未曾建立的，因而法院和公安部門的職權，也未曾很明確地劃分清楚。

3. 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新中國的檢察提上工作日程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條：「最高人民檢察署對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之嚴格遵守法律，負最高的檢察責任。」同法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檢察署設檢察長一人，副檢察長若干人，委員若干人。」同法第三十條：「……最高人民檢察署的組織條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之。」因此，現在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就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作如下之規定：第二條：「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依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條及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為全國人民最高檢察機關對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之嚴格遵守法律，負最高的檢察責任，全國各級檢察署，均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地方機關干涉，祇服從最高人民檢察署之指揮。」第三條：「最高人民檢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之直轄，直接行使並領導下級檢察署執行下列職權：（一）檢察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是否嚴格遵守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針與法律，法令；（二）對各級司法機關之違法判決提起抗議；（三）對刑事

案件，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四）檢察全國司法與公安機關犯人改造所及監所之違法措施；（五）對於全國社會與勞動人民利益有關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訴訟均得代表國家公益參與之；（六）處理人民不服下級檢察署不起訴處分之聲請覆議事件。」「前項各款之職權，在下級檢察署尚未設立的地區，得委託各該地公安機關執行，但其執行，須直接受最高人民檢察署的領導。」

4. 根據上述條文的基本精神來看，很明顯新中國的檢察，在本質上，當然迥異於資本主義與舊中國的檢察。就是在職權上，亦有很多差別，但也不全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可以說是屬於蘇聯範圍的第三種類型，其原因與理由見第五段。

五 對各種檢察制度之分析批判與說明

1. 資本主義各國的檢察

（一）資本主義各國的檢察，是爲了維持其少數反動統治階級，便利於剝削和鎮壓多數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故其主要任務，甚至可以說唯一任務，就是關於刑事方面的檢察。至於政府機關官員，是否違反法律，他們（檢察）是不管也無法管的，正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所以職權不大，舊中國的檢察，同樣是如此。這是資本主義各國和社會主義、新民主各國的檢察制度，在階級立場上不同的主要點。

至於沙俄檢察，雖在某一時期規定過：檢察機關有監督地方政權機關之任務，其實

是白紙寫黑字的空文。因為官吏專橫，檢察官無法制止。美國聯邦檢察長能執行對法院行政之權，是因聯邦檢察長領導司法署，實際上就成為司法部的。法國的檢察有檢察出版刊物許可之權，是為箝制工人和進步團體之輿論的。

(二) 法西斯國家德、意、日的檢察，雖則權力比較大，但他們也同樣只是關於刑事更加露骨地壓迫人民，成為白色恐怖統治的工具。所以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拘束，可以任意拘捕人民，不送機關審理，如德意志。可以自己提起刑事告訴，自己偵查，自己審判，如意大利。與憲兵警察狼狽為奸，任意拘捕不經審判，如日本。這種檢察，是由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帝國主義法西斯壓迫與剝削人民最惡毒的爪牙，而不是維護人民國家利益的，當然不能與社會主義新民主各國的檢察相提並論。

(三) 由於資本主義的檢察作用，是專為壓迫人民，而不是法律上的監督機關。所以他們的組織，不是單獨系統，且多在司法系統之下，成為法院的配偶，甚至附屬機關。這不是無原因的。故在組織領導方面，在人事任免方面，都與蘇聯不同。

2. 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

(一) 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制度，則與此完全相反。相同的，只是代表國家關於刑事偵查、檢舉、公訴這一點。並不佔主要地位。這因為它(1)已經消滅了剝削與被剝削兩個敵對階級，用不着靠檢察來壓迫人民；(2)由於經濟發展，文化提高，國內的犯罪減少，有亦不過是最少數，及帝國主義的間諜而已。

(二) 因此蘇聯檢察的主要任務，除鎮壓破壞份子（在新經濟政策以及幾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注意經濟建設方面的破壞份子。）及一般刑事偵查和公訴之外，還參與民事訴訟。這不過他們任務中幾分之幾而已。其最重要最廣泛部份，則是在於法律監督。例如對法院之裁判，對內務人民委員部所管之勞動改造場所，對各級政府以及軍事交通機關之決議、命令、對公務人員及人民行為是否合法性等都有過問、抗議、控告、公訴之權。因為它主要是為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嚴格實施，以鞏固蘇維埃政權，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三) 為要加強其法律監督，所以它的檢察，自聯邦一直到加盟共和國的最下層檢察機關，成為垂直的單獨系統，以便獨立行使職權。在全蘇維埃主席團直轄下，不受任何政府干涉，就是這個道理。

(四) 除檢察機關外，還有一個監察機關，據蘇聯法學專家說：監察的職權，主要是檢查政府工作的，例如檢查工作計劃是否實施，各機關尤其財經機關工廠有無浪費，公務人員有無失職貪污等不涉及法律範圍之事。在職責上，它不同於檢察有法律上監督之權。在組織上，也不同于檢察機關的另成系統。

(五) 由於檢察制度之完善，與幹部之健全，所以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其檢察機關，曾經為保護法制之實施，起了重大作用；曾經檢舉出若干暗害份子；曾經對雷農怠工與消滅牲畜，破壞集體農莊財產者作無情打擊；對少數公務人員在實行集體化時容許管

理的非法行為作不調和的鬥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自一九三二年公佈關於保護國家企業集體農莊與合作社及國家財產的法律後，蘇聯檢察機關，對於鐵路水路運輸中的盜竊及竊取合作社集體農場財產的不法行為，都給了致命的打擊。在衛國戰爭即蘇德戰爭中，蘇聯檢察機關，很努力地為保證執行關於鞏固後方和支援前線的各種法律，協助軍事指揮部在軍隊中建立鐵的紀律，在工廠中……在政府機關中……在人民中……在戰後，……（參看高爾謝寧著「蘇聯的檢察制度」）

（六）由此看來，今天蘇聯的檢察人員，的確是作到了根據法律、法令、決議和政策，為保護社會主義建設與全體人民利益成為作用很大的重要槓桿，全不同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檢察機關人員，只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哈吧狗，只是捕蒼蠅不打老虎的小工具。

3. 新中國的檢察

（一）各新民主國家檢察制度之可考者，如羅馬尼亞、如朝鮮的憲法與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所規定，同樣是走蘇聯的道路，就是說都是把檢察作為單獨的法律上的監督，而不是審檢毗連的配偶性機關。因而其工作範圍，就不僅是刑事方面的檢舉、偵查與公訴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在蘇聯的檢察機關，是由總檢察長負責，而新中國的最高人民檢察署，則採取委員會共同負責，如有意見不同，才取決於檢察長，以適合於民主集中制。

(二)這裡有須值得研究的：第一，蘇聯是已經沒有了剝削與被剝削階級。而中國則是階級複雜的社會，而且解放不久。暗害份子還多。因此，鎮壓反動的刑事檢舉在目前還佔相當重要地位。當然，由於國家的社會人員成份很不一致，爲了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權益，法律上的監督，同樣不應輕視。第二，蘇聯檢察制度之健全有力，是前後經過十六年的過程，幹部又很強。而新中國新檢察制度，剛才萌芽，加上幹部的數量和質量不夠，在目前恐怕只能按步就班有步驟地向着蘇聯方向漸進。第三，關於組織領導問題，在蘇聯也是從一九二二年列寧反對兩重隸屬制時候起，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徹底完成了單獨的垂直領導系統。而在領導一元化的新中國，恐怕法律上雖是單獨系統，而事實上還須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過程，那末是否可因條件不成熟，力量不充分，便採取右傾的等待主義麼？那就錯了。反之不按實際的具體情況採左傾的急進主義麼？那也不對。

(三)因此，最高人民檢察署的一九五〇年工作計劃大要是這樣：(1)有重點，分步驟，首先在各大行政區以及某些主要省、市、縣建立各級檢察署。其工作先從刑民事爲起點。同時兼顧到法律監督方面的問題。(2)在尚未建立檢察署地區，得委託公安機關代行檢察事務，但其職權，只限於刑事範圍。(3)上述一、二關於行使檢察範圍事件，完全受最高人民檢察署之領導與指揮。(4)領導系統與各級檢察人員之任免調遣問題，將仿照蘇聯辦法，逐漸試行。

論『兩種』從屬制與法制

列寧

——給斯大林同志轉中央政治局

在被指定來領導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常會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內，關於檢察機關問題引起了意見上的分歧。這種意見分歧雖沒有發展到需要機械地提交中央政治局的程度，但我個人認為，既然這個問題如此重要，提議把它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解決。

意見分歧的實質是這樣的：中央執委會推選出的這個委員會底多數委員在檢察機關問題上，反對地方檢察官祇能由中央委任並祇服從中央節制的規定。這多數委員主張也像對所有一切地方工作人員一樣，規定所謂『兩重』從屬制，就是說，他們一面服從自己所屬中央人民委員部，一面又服從地方的省執委會。

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底多數委員否決了地方檢察官有權從法律觀點上抗議省執委會及一般地方當局底任何決定。

我實在難於想像，究竟能用什麼理由來辯護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這一顯然錯誤的決定。我祇聽到這類理由，說在此種情形下擁護『兩重』從屬制，乃是進行反對官僚主義集中制，主張地方當局必要獨立性並反對中央機關對省執委會人員之高慢輕忽態度的合理鬥爭。對於法制一層，不能有加路格省或嘉桑省的法制，而祇應是全俄羅斯統一的，甚至是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統一的法制，試問在這種觀點上，有什麼高慢輕忽

之處呢？在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這一獲得了勝利的觀念底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兩重』從屬制的原則運用得不正確。在應該善於估計到有真正不免的區別的地方，『兩重』從屬制是必要的。加路格省的農業與嘉桑省的農業顯然不同。在全部工業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對於整個行政方面或管理機關也是如此。在這一問題中，若不估計到地方特點，就會陷入官僚主義的集中制等等，就會妨礙地方工作人員去估計作為合理工作基礎的地方區別。但法制應當是統一的，而我國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現象的主要禍害，正是對舊時俄國特具的觀念以及對希圖保留加路格法制使之別於嘉桑法制的半野蠻惡習，採取寬容態度。應該記住，檢察機關與一切政權機關不同，它沒有任何行政權，關於行政上的任何問題，它都沒有決定權。檢察官的唯一職權是：監視全共和國內對法律有真正一致的瞭解，既不顧任何地方上的差別，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響。檢察長底唯一職權，就是把案件提交法院去判決。這些法院是什麼法院呢？我國法院是地方法院。審判官是由地方蘇維埃選定的。所以接受檢察長提來的違法案件的這個當局，也就是地方當局，一方面必須絕對遵守全聯邦通行的統一法律，而另一方面，在判處罪狀時必須估計到各種地方情形，同時它有權說：雖然這案情顯係違法，但經地方法院查明又是當地人頗為熟悉的某種實際情況，却迫使法院認為必須對某某人減罪，或者甚至認為某某人應經法院判決無罪。如果我們不來絕對施行這種規定全聯邦統一法制的最起碼條件，那就根本談不上對文明性有任何保護和任何建樹了。

至於說檢察長不應有權抗議省執委會及其他地方當局底決定，這也是原則上不正確的；據說，根據維護法律的觀點，這種決定必須由工農檢查院來加以審查。

工農檢查院不僅從法律觀點上，而且從適當性上也要來從事審查。檢查長的責任是要使任何地方當局底任何決定都不與法律相抵觸，也祇有從這一觀點出發，檢察長才必須抗議一切非法的決定，同時檢察長又無權停止決定本身之執行，而祇是必須設法使對法制的瞭解在全共和國內，都是絕對一致的。所以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底決定，不僅本身是最大的原則上的錯誤，不僅把『兩重』從屬制底原則根本運用得不正確，並且破壞那確立法制和起碼文明性的一切工作。

其次，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還要估計到地方影響的作用。無疑義的，我們處在到處都是目無法紀的環境中，地方影響對於確立法制與文明性說來，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礙，也是最有利的障礙之一。大概誰都聽說過，清黨時，在大多數地方審查委員會內，最主要的事實是揭發了當地清黨中有個人和地方的挾嫌報復行爲。這一事實既無可爭辯，也是充分出色的。未必有人敢來否認，我們黨要找到十個法律學識充分和能夠對抗一切純粹地方影響的可靠共產黨員容易，要找到幾百個這樣的人就難得多了。當人們講到檢察機關底『兩重』從屬制或講到它必須祇服從中央節制的時候，問題也就歸結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中央這裏定要找到十來個這樣的人，由他們來實施中央檢察之權，如總檢察長，最高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員部底權限（究竟總檢察長是行使一長制權限，還是與最

最高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員部分權行使，這個問題，我權且不講，因為這是一個完全次要的問題，可以由不同方式來解決，總之要看黨是把大權交予一人，或是讓上述三種機構來分權辦理這點為轉移）。這十來個人居在中央所在地進行工作，受黨的這三個機關：中央組織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最親近的監視，以及與它們發生最直接的聯繫，而這三個機關都是反對地方影響和個人影響之最大的保障，並且最後這個機關，即中央監察委員會，祇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負責，其中沒有任何委員在任何人民委員部，在任何組織或蘇維埃政權任何機關內兼職。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有了比從來所考慮到的各種保證都更大些的保證，使黨能够去建立一個不大的中央集體，既足以在事實上對抗地方影響，對抗地方的及其他一切的官僚主義，並在全共和國和全聯邦內真正統一地來運用法律。所以這個中央司法集體可能發生的錯誤，也可以被黨的機關就地立刻加以糾正，而這些黨的機關對全共和國內所有我們黨的工作與蘇維埃工作，都一般規定有一切基本原則和一切基本規章。

如果離開這點，那就是暗地裏實行誰也不會直接公開擁護的一種觀點，即我國的文明性以及與之密切聯繫的法制彷彿已經發達到如此之高，使我們可以担保我們這裏能有一百個完全無可非難的檢察長——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受到任何地方影響，而能於自動地奠定出全共和國內的統一法制。

末了，我的結論就是說：主張對檢察機關實行「兩重」從屬制並取締它抗議地方當

局一切決定的權限 這一主張不僅在原則上是錯誤，不僅妨害我們那堅決實施法制的基
本任務，並且反映着地方官僚主義與地方影響底利益和偏見，也就是梗塞在勞動者與地
方和中央蘇維埃政權之間以及與俄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之間的一個最有害的障礙物。

所以我向黨中央委員會提議 否決在這方面的『兩重』從屬制；規定地方檢察機關
只能服從中央，並保留檢察機關有從維護地方當局決議之法制的觀點上來抗議地方當局
一切決議的權限和職責，但無權停止該決議的執行，而只有權將它提交法院處決。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口述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初次刊載於『真理』報第九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八至三〇二頁

蘇維埃檢察機關組織的基本原則

蘇維埃檢察機關組織的基本原則，在前已述及的一九二二年列寧致史大林「關於『雙重』管轄和法紀」（註）的著名函件中，曾有說明。列寧從單純法紀通行共和國「和整個聯邦」的原則，以及檢察官負有督察各地方當局每一判決不得違反法律的義務中，推演出所有檢察機關組織最重要的原則。爲使檢察機關得以「不顧任何種類的地方特點和地方勢力」維護真正統一的全國法紀，牠必須集權中央，對地方政權完全獨立。

爲使其在工人階級獨裁爲共產主義所作奮鬥中，成爲有力而靈活的工具起見，檢察機關必須如列寧所說，「在黨的三個組織最嚴密監督和最接近聯繫之下進行工作。三個黨組織是：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局，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這三個黨組織高度防止地方勢力和個人勢力的侵入。」同時爲使這種由上層指導的中央機構不致侵害地方政權組織（勞動代表蘇維埃——蘇維埃社會秩序的政治基礎）起見，檢察機關必不得爲行政機關，必不能自行統治，必不能由其本身對國家行政作最後的決定。他只須負責督察地方政權組織，依照法律處理事項。如果任何人頒發非法的命令，或任何人有非法的行爲，檢察機關必須對此非法命令提出抗議，並將此種非法事項移送上級機關決定。如上級機關所作決定仍與法律不符，檢察機關可以再提抗議，俾將此事轉達國家

（註）列寧全集（俄文本）卷二十七，頁二九八——三〇一；參閱前第一節所引。

政權的最高機構，來作最後的決定。如果非法行為是刑事性質的，檢察機關的任務，並不限於提起控訴，牠必須督促違反法律的人受到刑事處分。但即於此點，牠也不能作最後的決定。

檢察機關發動並偵查一個刑事案件，但於發動偵查之後，牠的「唯一權利和義務，便是將此案移送法院去判決。」（註一）

檢察機關在法院中以訴訟之一方的權利出現，以國家名義提起公訴，但在最後決定中並無地位，判決是屬於法院的。但檢察機關仍須注視判決是否與法律符合，並有責任對任何種類缺乏事實根據或不合法律規定的刑事判決，提起上訴，由高級法院再加審理，高級法院的判決，仍可由檢察機關再提上訴。

列寧的這些原則，便是一九二二年蘇維埃檢察機關組織的基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的法律，（註二）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檢察機關，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為其首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的法律（註三）及此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將檢察機關的組織，與原屬同一系統的聯邦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會的機構分開。檢察機關成為全聯邦的統一集中機構，並確保其對一切地方（包括共和國）政權組織的完全獨立性。

（註一）列寧全集（俄文本）卷二十七，頁二九九。

（註二）С.С. 一九三三年，第四〇號，第二三九條。

（註三）С.С. 一九三六年，第四〇號，第三三八條。

在史大林憲法下，檢察機關是一種嚴格集中的機構。第一一三條指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檢察官——不是檢察機關——負責行使最高監督權。所以，各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均未另定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系統無關聯的獨立監督權。「在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各人民委員會及其一切附屬之機構，以及各公務員、個人、及公民均應嚴格執行，並遵守法律，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直接並經由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檢察官，行使最高之監督。」（註）此事在其他聯邦國內，也有同樣的規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第一一七條規定，凡屬檢察機關的機構只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機關的管束。

實現檢察機關集中原則不可避免的後果，是檢察機關對地方政權組織的獨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將一切檢察機關的機構應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管轄的規定和他們應對「任何一切地方機關獨立」的規定列在同一條內（第一一七條），並非偶然。只有在這種獨立的情形下，他們才能正確的執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的指示，並對在「地方特殊」色彩下各種破壞法律的企圖，奮鬥防止。

檢察機關與法院不同，是建築在嚴格的統一負責原則之上的。所有比較重大的案件，在法院中，係由法官開庭，以多數取決，而在檢察機關中所有問題，都只由檢察官以命令決定，檢察機關的首長有權對所屬案件作成決定。這並不至消滅了檢察機關中廣泛批評

（註）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第一一七條。

和自我批評的可能。機關內的每一人員，在大會中或報紙上，對其長官、檢察官、所作的錯誤行動有權批評。並且，每一人員對其直屬長官的行為如認為錯誤，有權並有義務向長官——各級長官以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提供報告。

這種檢察機關建立原則的自然後果，也就是這種機關登用人員的方法——不以選舉而以任命的原則為基礎。一切檢察機構單純直線的由下而上接受管束，也預先假定了各級人員任免應直接由上而下的方法。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第一一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係由國家最高政權機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所任命，任期七年。任期所以如此的長久，超過憲法上任何職位任期的規定，是因為：穩定的指導，對保衛法紀的機關，有特殊的必要。史大林在第八次全聯邦特別蘇維埃大會中說：「法律的穩定，對於我們比在任何時期中更屬必要。」法律非但在頒布時，而且在實行時，均須要穩定，而監督法律的實行，正是檢察機關的基本任務。其他檢察人員的任命，出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各聯邦各自治共和國以及地域、區域檢察官，都是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直接任命的（第一一五條）。

地區、區、及市檢察官係由聯邦共和國檢察官任命，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核准（第一一六條）。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官外，所有檢察官任

期均爲五年。

檢察機關的集中制度——檢察機關工作指導和檢察官任命所根據的統一負責原則——並不損害蘇維埃檢察機關的民主，和牠與廣泛勞動大眾不可分解的聯繫。牠是民主的，因爲牠從世界最民主的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獲得牠的全權，並且因爲，如我們前文所說的，牠的工作，係與蘇維埃人民最民主部份，勞工階級的前鋒，共產黨的指導機構，有不可分解的聯繫。牠的結構是民主的，因爲牠大多數的幹部，都是人民最民主階層，工人和農民的代表。牠的任務是民主的，在最後分析中，可以謂爲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防衛。牠的工作方法是民主的，因爲是根據牠們的機構與廣泛勞動大眾密切聯繫而來的。所有蘇維埃社會中的機構，共產主義青年團（Young Communist League）、各工會、工人通訊員、和農民通訊員等等，都積極參加蘇維埃檢察機關和牠爲加強社會主義法紀而奮鬥的工作。

但是除却利用蘇維埃社會中一切機構的協助外，檢察機關的工作，也同時依賴其本身的黨社會工作人員，如合作團體和革命法紀部分等。公眾參加檢察機關工作的最重要方式，是由急公好義的工作者，根據檢察機關的委命，以檢察官身份出席法院。

參加檢察機關工作的社會人士，是充實該機關工作幹部的後備。蘇維埃檢察機關，和資產階級國內不同，與民衆之間是沒有鴻溝阻隔，而且是氣息相通的。在社會工作中已經露面的積極社會工作人員，得轉任蘇維埃檢察機關的常任人員，正是蘇維埃檢察機

開真正民主與蘇維埃人民密切難分的生動說明。

雖在資產階級最民主的國家內，檢察機關與真正人民，勞動大眾之間，終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即是（例如美國）地方檢察官出自選舉的地方，他們也不是和人民，而是和聯合選舉他們的資本主義組織——有時竟是和職業罪犯相聯絡的。

美國官方的守法情形報告編纂人曾寫道：（註）

刑事司法和地方政治，關係密切，使前述國家檢察的弊端增劇。檢察機關和政治的這種聯繫，成爲檢察制度的亂源，已爲盡人皆知的事實。腐化的地方政治組織和犯罪組織之間，發生密切聯繫。前者利用法紀的破壞和罪惡，後者則加以組織。競選運動基金的來源，幾等於出賣違反法律的執照。這種事態，在刑事司法行政的健全系統下，往往不易推進。所以腐敗政治和犯罪組織的聯合，必須控制檢察機關或使其活動不能生效。所以具有阻止控訴獲得審理的巨大力量，而又缺乏組織，不受中央管制，責任未經明定的檢察機關，遂成爲政治上最大的獎品。在大都市現行的政治環境中，除偶然激起了公憤外，檢察官的選擇，是以政治組織的便利，而非以執行法律的任務爲準則的。檢察官的短期選舉制度，其助理人員又以政治後台爲選擇基礎，任期無定，而又具有廣泛含混的權力，最適宜於弊竇的滋生。檢察官完全自法院中退出，專力於政治方面和大衆注目的偵查任務，將檢察工作，完全交給助手，已成慣例。在「對人民負責」的口號下，常常舉行選舉的選舉制度中所需要的，不是檢察工作如何能够有效率的執行，而是要牠能惹人注目的執行。

其他資產階級國家的檢察機關均出自任命更不足論。

資產階級國家檢察機關的組織，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機關的組織，有一點根本不同，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檢察機關首長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檢察機關首長一樣是由議會任命，並對行政獨立的。在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內，包括法國、德國、和帝俄，行政部份的一員，即司法部長，指揮法院的工作，也同時指揮着檢察機關的工作。所有檢察機關內的工作人員，都由他任命，其工作也由他指揮。削減檢察官受司法部長操縱的企圖——不過給予該機關一種獨立的象徵——在資產階級國內，總歸失敗。

(註)全國法律遵守與執行調查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w Observance and Enforcement)，檢查制度報告書 (Report on Prosecution) (華盛頓，一九三一年，) 頁一三——一五。

帝俄時代所謂法院設置研究院(關於法院組織規程的)的草案，其中第八十二條，「檢察機關人員，在宣布其對於案件的意見時，應不受任何命令之拘束。」這點引起司法部長冉亞庭 (Zarnyatin) 的反對。他在對該條的意見書中說：

法官的完全獨立(註一)是必不可少的。為維持法院權力的尊嚴，——完全消滅偏見和阿諛主義的疑慮——是必要的。但檢察機關人事獨立的原則，則與此項機關應嚴格統一指揮的原則，和在該機關各階級中，年幼者應受年長者管轄的規律，均不相符。(註二)

但檢察機關工作人員除「正式」隸屬於司法部長外，同時並非正式的，但非常真實

的隸屬於警察。列寧將沙皇檢察官坦白的呼爲與警察關係最密切的官員。（註三）馬克斯在寇恩共產黨人控案的真相中曾說：

在偵查時已盡了檢察官吏義務的警察，在法院訴訟進行中，又以證人的身份出席。在普通的檢察官旁，政府又設置了一個特別的檢察官；在檢察機關之旁，又設置了警察；在史蒂特（Stettin）和賽肯道夫（Sankendow）（正式檢察官）之旁，又設置了史第伯（Scheber）（秘密警察首長，上一世紀中葉德國間諜的組織人）和他的助手威爾穆次（Weilmuth）、伏季爾（Vogel）、葛理夫（Grew）、和何得漢（Hottel）等。這種第三方面國家權力，不可避免的侵入法院，警察的超特力量，遂得經常的供給司法控訴以他所無法捕風捉影的事實。法院方面也非常明瞭其地位，所以院長、法官、和檢察官，以最可誇讚的謙讓態度，先後將他們各個的職責，拱奉給警察律師和證人，史第伯，而經常的躲在他的背後。（註四）

（註一）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獨立」的真正意義爲何。

（註二）國務院日報（Journal of State Council），一八六四年，第四八號，頁一七一—一八。摩拉夫也夫（H. Muraviev）著檢察指導（Direction of Public Prosecution），（莫斯科，一八八九）所引用，頁三九五。

（註三）參閱列寧全集（俄文本）卷四，頁八四。

（註四）馬克斯與恩格斯合集（俄文本）卷八，頁五〇五。

但有一個時期，資產階級還認爲有利用民主裝飾來掩藏其國家機構所施壓迫行爲的必要，所以檢察機關和警察的密切聯繫很少的公開表現出來。檢察機關雖受命不顧一切

的維護統治階級的權益，但仍須顧全相當的體面。當時任莫斯科法院檢察長（Public Prosecutor of the Moscow Court Chamber）的帝國司法部長摩拉夫也夫對檢察機關所表示的願望，最足作爲此點的標準例證。檢察官應「嚴格遵守法律，但不至爲形式所拘，使控訴受其桎梏；應尊重人道，但不至爲情感所動而減緩罪刑；應保持公正，但不至於漠無感覺；應保守鎮靜，但不至流於柔懦，動輒爲對方所敗。社會所需要於檢察官吏的是：以主動力量審慎周詳的維持對國內仇敵（註一）的鬥爭，而勇敢決斷的排除萬難不計毀譽來加以合法與合理的執行。」（註二）

但當資產階級遭遇到革命狂瀾的壓力，卸除了一切民主的偽裝，而採用公開瘋狂的恐怖方法，即法西斯主義的方法時，檢察機關甚至連這類表面需要的禮貌也棄如敝屣。

（註一）按即被壓迫階級革命運動的代表（編者）。

（註二）摩拉夫也夫前書，頁五三〇。

杜塞爾道夫（Dusserdorf）的律師，安拉次（Kaspar Anrath），坦白的提出檢察機關應移歸內政部管轄的提議。（註一）喬治·達姆（Georg Damm）聲稱：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應支持「元首（Der Fuhrer）的意念，因爲，他在訴訟中，有效的「考慮到事實和政治的需要；」換句話說：他是主張將專擅和無法的觀念，假檢察官之手來實行的。（註二）法西斯德國最近的立法（類如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法律）賦予法西斯檢察機關以權限，得在刑事案件中，舉行不受管制的偵查，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拘束。

法西斯德國所廣泛利用的「預防性逮捕」習慣，使檢察官員得以拘押任何人，雖然他並未犯任何性質的罪，亦得加以羈押，在無限制的時期中不送司法機關審理。賽爾曼（H. Selman）「事件」便是一個例證，法西斯監獄看守人已將他拘禁五年，而希特勒的「人民」法院還沒有決定將他移送審判。

法西斯意大利的檢察機關，地位亦復相同。一九三一年意大利刑事訴訟法規的解釋中，坦白說明：檢察官員，並不是一種奉行法紀的機關，他只是一個告訴人。這種法規，禁止他採取任何行動來維護被告人的權益。在法院檢察聯合制度最低層的司法員（Pretor），將檢察官和法官的職責合於一身。他本人提起刑事的告訴，自己偵查，又自己以法官的地位來加審理。

（註一）安拉次：由人類思想中推演之刑事訴訟正確方式（Die richtige Gestaltung des Strafverfahrens entwickelt aus dem Wesen des Menschendenkens）。（柏林，一九二四年）。

（註二）達姆：論刑事訴訟程序之改革（Bemerkungen zur Reform des Strafverfahrens），載刑法雜誌（Zeitschrift furs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B 四四，四。

因此，在法西斯獨裁國家內，檢察機關失卻了他最特異的特點：牠不復是一種監督機關，而本身操持了巨大的行政權利，在事實上，則完全成為法西斯秘密警察的附屬品，是執行專擅、慘痛、而無約束的恐怖工具之一。

只有在社會主義工農國家內，檢察機關才能建立於列寧的訓示之上，事實上成為法紀的保護人和維護人民真正權益的工具。（錄維辛斯基著「蘇聯法律」第一章第四節）

蘇維埃檢察機關的任務與功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第一一三條授權檢察官「對各人民委員會及其一切附屬機構，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官員及人民，確遵法律，作最高之監督。」他以直接方式，並得經由統治中心的和農村區域的檢察機關，來實施這種監督。至達成監督的方法，則在各個法律內，加以規定：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檢察機關規則（註：ON. 1 九三四年第一號第二條）及民刑訴訟程序法規。

檢察機關的監督，首先由注視各政府機關，各國家或社會機構，均不得頒發或施行與法律不相符合的命令或措施，來加以表現。牠有義務，對每一違法的命令或措施，自動或根據權利受侵的公民所提告訴，提出控訴。

這種義務，是蘇維埃檢察機關和資本主義國家檢察機關最特殊的異點之一。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政府當局從不願其本身機構恪遵法紀，以便確保持有利的環境，來實現其極度的剝削。其機構的基本任務，便是長使被剝削階級，居於服從的地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機構，在執行這種任務是，必然不免要違反資產階級國家本身的法律。資產階級國內的許多法令，包括保障資本主義企業下工人勞力的所謂「工廠立法」在內，都是受大眾壓力方始頒訂的，資產階級無意使這類法律受嚴格的監督，以確保其確實遵守。

「當英國教堂委員會關於童工問題的報告書（註一）提出議會時，阿賈來勳爵（Lord Ashley）急忙的提出法案，絕對禁止礦場中雇用婦女，——並對童工嚴加限制。這條法案隨即通過，但在許多地方仍屬具文，因為並未派有礦廠稽查員來監督其實行。」（註二）

在一連串的事例中，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最高機關，直接希望警察和其他地方政府機構，在壓制被壓迫階級時，不必過分的顧慮法律。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內，檢察機關，若非與監督政府機構行動是否合法的任務完全脫離，便是將監督權局限於比較不重要的狹隘範圍，且只在形式上加以行使。

司法部長在他致國務院的函件（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論及改組後的沙皇檢察機關對政府機關的監督說：「由檢察機關監督各機關所執行的一切事件，並非不可或缺的；因為這類事件，已由各機關人員和服務各該機關人員的活動，並由其直接長官的監督，確保能得正確的進行和解決。」（註三）這便是說，政府機構的活動，必須用分層節制的方法來施行監督。馬克斯解釋這種監督的意義說：「高階級層對於官員犯罪，只就其有侵害高級階層或為高級階層認為不必要的罪行，才加以懲處；但如所犯之罪行，是高級階層本身的罪行，則反加以保護。」（註四）

（註一）這篇報告，說明工業階級的剝削兒童，在社會輿論上造成極深的印象。

（註二）英國工人階級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Worker (Class in England)）——馬克斯

和恩格斯合集（俄文本）卷三，頁五三〇。

（註三）摩拉夫也夫前書，頁四三二。

（註四）馬克斯和恩格斯合集（俄文本），卷一，頁五七四。

如我們透過表面來視察，則帝國司法部長這篇議論的意思是，使專擅和違法的行為，成為合法。這種雖帝俄部長尚須用隱晦而莊嚴的理論來加以掩飾的話，法西斯主義卻公然宣之於口。意大利前司法部長，墨索里尼最親密的夥伴之一，羅科（A. Rocco），曾為一條規則規定法西斯警察和黑衫黨人，因執行「維持治安」的措施，被認為有罪須受刑事制裁前，應先取得司法部長的許可，寫出如下的辯解：「如果受任命的官員和代理人，在每次執行職務需要採取一種——在抽象方面——法律認為是犯罪的行為時，不能在法律上免除受刑事檢舉的危險，我們將無法希望他們能以適當的速度和勤奮，來執行其任務。」（註：參閱意大利刑事訴訟法規草案（一九三〇年）解釋第十頁。）

因此，這類公然專擅的罪行，只須是爲了保持法西斯「秩序」的利益，即可在事前確保不至受法律的制裁。

只有在法律確實表現人民意志的社會主義國內，法律的確切遵守才能得到有效的監督。行使這種監督，正是蘇維埃檢察機關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如違反法律構成犯罪行為，則檢察官員應即使犯罪人受到刑事制裁。

查緝每一罪行，使受懲處，同時與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和法院相聯合，向一切托

洛茨基·布哈林匪黨的餘孽，法西斯偵探的雇傭、間諜、和背離份子，社會主義財產的竊盜，並向強盜、竊賊、和流氓——總而言之，向各種罪犯——作決定性的奮鬥，是檢察機關的第一個任務。蘇維埃檢察機關，雖對人民的仇敵以完全布爾什維克的果斷和冷靜來執行，同時也必須注意使原來用以應付罪犯的方法，不致影響到無可譴責的無辜；確保每一刑事案件，均由各方面偵查審理，俾每一受鞠的公民，於告訴不實時，均得實施其憲法上的辯護權，以證明其無罪。這種任務，檢察機關是以發動刑事告訴，監督偵查，和參加法院內的工作，來加以實行的。檢察機關應注視刑事案件的調查正確而合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第一二七條特別規定，檢察機關應監視逮捕的合法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公民，非經法院命令或經檢察官核准，不得逮捕。刑事案件，除特別重大者外，在偵查完畢後，非經檢察官核准，不得移送法院。

在法院中，檢察官出席為國家所提公訴辯護。他的義務是，在法院中援引證據以確定被告人之罪行，在訴訟程序中他以原告人的地位提出辯論，以暴露其所偵查的罪狀。但即在法院中，他亦只在仍信被告為有罪時，才保持其原告的地位；同時他須隨時注意，法律應確被遵守，案件審理應完全正確。如在訴訟程序中，所提公訴未蒙受理，檢察官應即撤回其告訴。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企圖對檢察官這種撤回的可能，加以限制。例如，在類似法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內，檢察官祇能在審理次要案件的所謂「感化警察法院」(corrective police court)中撤回公訴。在審理一切重要罪行的巡迴法院(jury court)

中，不論法院審理的可能結果如何，檢察官無撤回公訴之權。

檢察官以國家告訴人的身份出庭，不能對法院作任何有拘束力量的指示。他與被告人享有同等的權利。在法院審理的階段中，他是法院的助手。因他參加法院的審訊，因他以原告身份來辯論，他幫助法院使對案件能作正確的判決。另一方面，雖在此處，他仍不失為監視法紀的機構；確保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已履行法律上所需要的一切。

訴訟雙方在法院內地位平等的原則，資產階級國家雖在理論上作此主張，但在事實上——不但在實行方面，即在立法方面——均棄而不顧。例如，帝俄的刑事訴訟法，對檢察官向法院表示要傳喚證人和專家證言之類，稱為「要求」(demands)，並承認其有拘束法院的力量，而被告及其辯護人向法院表示同一事項，在法律內則稱為「聲請」(petitions)，法院可以自由准駁。(註一)並且，檢察官提出「要求」，不受任何時限，而被告及其辯護人則必須在自委任辯護人之日起七天內「聲請」。檢察官亦不需如被告或其辯護人，解釋其需要某一證人的原因。這種顯然背離雙方地位平等原則的原因是有下列的動機的：

雙方對於案件，並非立於完全相同的關係之上的：檢察官係代表一種「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法律來舉證的。……被告對案件的關係，却不如此。雖是一個無辜的被告人，在其盡力以求開脫的自然願望中，將不能分辨案情中主要與非主要的事實，亦必希望能用證人的證言，一併加以證實。(註二)

其實隱意是，要使被告很難有完全的自由來執行辯護，而檢察官則有隨意捏造訴狀的完全自由。

西歐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其訴訟程序的壓迫性格，掩飾得比較巧妙。雖承認被告人有請求傳喚補充證人和專家的權利，但利用一條規則，以立即繳納相當於法院費用的現金，作為傳喚條件，以達成同一目的，更足證明資產階級的民主根本上是為富人的民主。

（註一）刑事訴訟規則第五七三—五七六條。

（註二）刑事訴訟法規提案（一八六三年）解釋頁二八六—二八七。

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內，當事人雙方在法院內地位平等的原則，是完全以論理推演不受任何限制的。並且，檢察官對各法院所為判決，有違反法律，或證據不足者，有義務向高級法院提起上訴。蘇維埃檢察機關在法院工作範圍內的特點是：檢察官也廣泛參加民事的訴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他對民事訴訟的參加是極為有限的。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內，他得視國家或勞動者的權益需要，提起民事訴訟，或在訴訟的中途參加。檢察機關參加民事訴訟，是保護蘇維埃公民權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他在這一方面的活動，例如在贍養費案件中，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檢察機關應負責監督法院刑事判決的執行。這種監督，不僅限於判決交付執行的時間（如被判喪失自由的人應受逮捕），且推廣到法院判決的執行全期。特別是檢

察機關監督有關喪失自由判決的執行，有極大的意義。

檢察機關處理人民告訴的工作，極為重要。每一公民認為其權利受到任何人的侵害，均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檢察官必須加以偵查。如他認為尚有理由，應立即採取行動，以保障告訴人的權益。如這種侵害權益係屬刑事性質，應即使犯罪人受到刑事制裁。工人和國家農場人員，於他們政治、勞工、住屋、個人、和財產等權利被侵害時，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任何資產階級國家的檢察機關都不執行這種工作。在那裡，只有請求提起刑事告訴時，才求助於檢察機關。

上述蘇維埃檢察機關各種的權能，彼此之間都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不論是發動或偵查刑事案件，或以原告身份出席法院，或處理告訴，或對任何政權機關的非法指示提出抗議，蘇維埃檢察官員都是社會法紀的守護人，共產黨和蘇維埃政策的領導者，也是社會主義的衛士。（蘇維辛斯基著「蘇聯法律」第一章第五節）

參考書目

蘇聯的檢察制度（高爾謝寧著，新華書店出版）

列寧論檢察制度與監察工作（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編，新華書店印行）

蘇聯法院和檢察機關（維辛斯基著，張子美譯，商務印書館發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检察制度

作者 =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编

页数 = 3 8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1 9 5 0 . 0 6

出版社 =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

书名
目录

- 一、 各国检察制度纲要 & 李六如
- 二、 论「两重」从属制与法制 & 列宁
- 三、 苏维埃检察机关组织的基本原则 & 维辛斯基
- 四、 苏维埃检察机关的任务与功用 & 维辛斯基